

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

雷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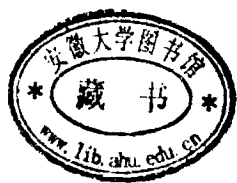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

雷

戈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雷戈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4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

ISBN 7-5325-4338-2

I. 秦... II. 雷... III. ①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國—秦漢時代②政治制度—研究—中國—秦漢時代

IV. ① D092.32 ② D69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12275 號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
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

雷 戈 著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印刷四廠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7.125 插頁 5 字數 420,000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7-5325-4338-2

B·543 定價: 49.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作者簡介

雷戈(1962—)，河南洛寧人，博士，南京師大歷史學副教授，主要從事史學理論、思想史、史學史研究。致力於創造一種“現實理性主義”或“現實批判主義”的歷史思想體系。新歷史觀（“歷史即現實”）、新史學觀（“史學即思想”）、新史料觀（“史料即語言”）三位一體。論文百餘篇。著作有《歷史與意義》、《哲學主義的歷史》、《沒有歷史的歷史學》、《歷史學何為》。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第一輯）

- 一 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
- 二 秦制研究
- 三 魏晉南北朝文體學
- 四 李燾事迹編年、著述考辨及詩文輯存
- 五 杜詩釋地
- 六 關中方言古詞論稿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第二輯）

- 一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
- 二 秦漢人物散論
- 三 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
- 四 文心雕龍學分類索引
- 五 宋代文獻學研究
- 六 清代《儀禮》文獻研究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出版說明

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老舍、沈從文、洪深等為代表的著名作家、學者,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殷孟倫、殷煥先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以丁山、鄭鶴聲、黃雲眉、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王仲華、趙儷生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但是,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銳挑戰。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

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科技哲學、文藝學、民俗學、中國民間文學等。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同時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知名學者蔣維崧、王紹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為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興滅業、繼絕學、鑄新知,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是本院工作的重中

2 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

之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正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的研究叢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003 年 10 月

目 錄

緒論 學術史的梳理與論題的構想

一、作為思想史範疇的後戰國時代	1
二、後戰國時代思想史研究現狀的基本評估	9
三、皇權主義：舊問題與新視野	15
四、皇權主義與王權主義的概念辨析	17
五、制度分析之依據與技術分析之內涵	22
六、觀念-實踐：思想史的共識基礎	25
七、天高皇帝近：皇權主義秩序之生成	29

第一章 時代格局與思想特性

第一節 後戰國時代格局	35
一、皇權體制	36
二、分封觀念	42
三、諸侯集團	48
四、多元思想	59
第二節 後戰國時代的思想史性質與價值	64

第二章 皇權主義核心價值的初步 型構：以皇帝觀念為中心

第一節 皇帝誕生的思想意義	76
一、“皇帝”概念的思想史定位	76
二、“皇帝”名號的思想史發生	78
三、“皇帝”觀念的思想史釋義	86
第二節 皇帝出身的觀念轉換	92
一、思想論證——“匹夫天子”觀念的源起與流變	92
二、歷史闡釋之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101
三、歷史闡釋之二——“彼可取而代之”	108
四、歷史闡釋之三——“大丈夫當如此也”	113
(一) 大丈夫皇帝	113
(二) “起於細微”	115
(三) “天下絕望”	117
第三節 皇帝觀念的個體原型	
——始皇帝的觀念解析	124
一、尚法	124
二、崇儒	129
第四節 皇帝身體的政治想像	133
一、秦始皇的身體	133
二、漢高祖的身體	137
第五節 皇帝作為的類型分析	142
第六節 皇帝權力的思想認同	148
第七節 皇帝職責的自我省思	161
第八節 皇帝專制的理性邏輯	170

一、專制與理性	170
二、皇帝理性之實踐	172

第三章 皇權主義普遍規範的逐漸確立：以 官僚意識、士人共識、國家理念為中心

第一節 官僚意識的思想史分析	177
一、為吏之道	177
(一) 法·道·術	177
(二) 忠君·愛民·修身	181
(三) 帝·吏·師	185
二、“待罪”的觀念意義	193
(一) 百官皆罪	193
(二) “待罪宰相”	199
三、法律與罪名——官僚意識中的恐怖幽靈	206
(一) “待罪”於秦廷	206
(二) “待罪”於漢廷	209
第二節 權力遊戲與官場規則中的政治共識	216
一、作為遊戲規則的君主觀念	216
二、封建理想與天下秩序	227
三、暴政與政治道義	236
四、功德標準與政治評價體系	245
第三節 早熟型民族-國家的意識生成	261
一、帝國背景下的中國意識——《公羊傳》：一種經典 文本的表述	261
二、皇權主義的天下觀	265
三、始皇高祖時期漢匈關係對漢民族意識的引發	272

四、文帝時期漢匈關係對漢民族-國家意識的塑造	277
五、“三表”與“五餌”——賈誼的帝國戰略	284
第四節 帝國秩序的觀念實踐	288

第四章 皇權主義基本模式的複雜 塑造：以意識形態為中心

第一節 意識形態在後戰國時代確立之條件	297
一、專制皇權	297
二、理論啓蒙	301
三、世俗社會	304
第二節 意識形態在後戰國時代確立之論證	311
一、“以吏為師”：意識形態的總體要求	311
二、“以吏為師”：意識形態的專業規定	318
三、“以吏為師”：意識形態的一般標志	322
第三節 博士官的制度設置與價值設定	326
一、博士俸祿	326
二、博士弟子	337
第四節 意識形態思想控制的體制性權力 ——焚書與坑儒	341
一、火其書	341
二、人其人	352
第五節 意識形態對知識形態的區分與控制 ——解讀“焚書令”	362
一、知識背景	362
二、控制策略	366
三、吏師天下	372

第六節 意識形態對後戰國諸子的整合與規範·····	378
一、意識形態的功能性機制·····	378
二、意識形態架構中的儒道法“三位一體”·····	382

第五章 皇權主義本質精神的直觀體現： 以部分禮制、儀式、建築為中心

第一節 “太上皇”	
——皇權政體的理性設計·····	396
第二節 廷議程序與君臣秩序·····	403
一、始皇廷議·····	403
二、二世廷議·····	406
三、漢廷廷議·····	409
第三節 燕禮儀式與尊君意識·····	415
一、燕禮之意義·····	415
二、燕禮之定義·····	418
三、皇帝之燕禮(上)·····	423
四、皇帝之燕禮(下)·····	426
五、其他人之燕禮·····	430
第四節 皇權主義的儀式呈現·····	434
一、序說·····	434
二、出巡·····	436
三、刻石·····	440
四、賜爵·····	450
五、大赦·····	461
六、立廟·····	470
七、選鄉·····	474

6 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

八、藉耕	476
九、改元	478
第五節 皇權主義的空間造型	490
一、序說	490
二、都城	494
三、宮殿	499
四、道路	502
五、陵墓	505
六、金人	508

申論 思想之後的繼續思考

一、推演論題	512
二、審視問題	516
三、考量方法	519
參考文獻	523
後記	537

緒論 學術史的梳理與 論題的構想

一、作為思想史範疇的後戰國時代

“思想史”是一個沒有確定性界限的概念^①。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在最為寬泛意義上的正當使用。所以對於“思想史”一說，最常見的情景反而是最少爭議和分歧。因為它處於某種不言而喻的共識狀態。

自 20 世紀有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以來，先秦兩漢這段思想史的研究基本呈現一種“馬鞍形”狀態，即兩頭高，中間低。戰國諸子始終是一熱點，漢代董（仲舒）、王（充）諸家亦為重點。相形之下，秦朝至漢初八十年却顯得有些寂寞。更重要

① 我同意史華茲的意見，“思想史”的趣味正在於“‘思想’（thought）這個詞語的語義邊界是不確定的。它可以包含認知、推理、意向性、想像力、情感、驚嘆、困惑以及不能在計算機上輕易編程模擬的意識生活的許多其他方面的內容。此外，它還有其他一些模糊的涵義，既可以指思維過程（process of thinking），也可能指諸如觀念（ideas）、心態（mentalities）或內在態度（inner attitudes）之類固定化的思想‘產品’”（《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第 14 頁注釋 1，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另外，陳啓雲通過對“哲學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及“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y）之間的區分，提出了“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用以“強調思想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見《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歷史論析》第 1 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的是，對這段歷史、社會、政治和思想，人們一直不能給予理論上的明確定位，即形成一個相對清晰的理論框架來分析和描述這段歷史和思想。將秦漢視為一個整體，強調其社會形態和政治制度的一致性，確有道理；反之，強調秦制漢政之殊異，也有道理。但無論是“熱”還是“冷”，其思想史斷代均屬一種自然時代範疇。

思想史時代有兩種性質：自然時代與觀念時代。所謂“自然時代”就是朝代的自然順序，習稱的先秦、秦漢就是自然時代。所謂“觀念時代”就是根據特定研究意圖而對歷史時期所作的重新劃分和切割^①，其目的是凸顯該時期的思想史特性，即突出該時期特有的觀念價值。簡言之，“觀念時代”即是打破朝代界限而重新規劃的思想史階段。如果說戰國思想史是自然時代範疇，那麼後戰國思想史就是觀念時代範疇。在我看來，自然時代與觀念時代之兩分并非基於思想史內緣外緣兩個層面之確認，而本質上是兩種類型之差異。思想史時代兩種類型的規定不僅僅是思想史的分期或斷代所需要，更是揭示思想史結構所必須。

作為一種思想史觀念，我把觀念時代具體理解為思想史的中時段性。因為思想史的長時段研究和短時段研究的局限都比較明顯，而中時段方法則具有更大優勢。我對中時段的定位是百年左右，其伸縮尺度最好是70—130年。觀念時代作為思想史中時段性的好處是，它可以直接付諸史學研究實踐。雖然就理論而言，觀念時代範疇原則上可以適用於長短各個時段，但從史學研究特性看，中時段應該是最好的定位。當然這也涉及到一個時代遠近與文獻多寡的問題。所以三代就只能用長時段，則現當代就可以用短時段。比如，20至50年，就可以構成一個有效的觀念時代範疇。

^① 在某種意義上，它也不妨視之為對思想史的不同階段和層面所作的“分期”。

馮友蘭對中國思想史曾有一個“一分爲二”的觀點，一部中國思想史可以劃分爲兩個階段：“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儒家之興起，爲子學時代之開端；儒家之獨尊，爲子學時代之結局”^①。他的《中國哲學史》就是這樣寫的，“上篇謂自孔子至淮南王爲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爲爲經學時代”^②。上下兩冊，各分一半，倒也公平妥當。對此我也有個相似的看法，即中國思想史可分爲“道”、“術”兩個時代。春秋戰國即爲“道的時代”，秦漢至明清即爲“術的時代”^③。正因如此，對思想史的技術分析在秦漢以後就顯得特別重要，甚至具有根本性。但從思想史中時段性的角度看，無論是“子學時代”、“經學時代”，還是“道”、“術”時代，都不能構成真正具有可分析性和操作性的觀念時代範疇。因爲它們都太大了^④。所以我覺得，子學時代還應細分爲戰國和後戰國兩個階段。這樣，後戰國就具有了雙重觀念性質，既是“子學時代”之終結，同時又是“術”時代之開始。所謂觀念時代性質，其含義正在於此。後戰國時代也因此而成爲一個思想史的中時段研究之嘗試。

20 世紀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使用自然時代範疇產生了不少有分量的學術成果。但局限性也甚爲明顯。以後戰國爲中心，可以看出人們使用自然時代範疇來對先秦秦漢思想史的分期和論述，有這樣幾種大同小異的觀點。

馮友蘭說，戰國末期到秦漢之際，中國思想界不但有一種

① 《原雜家》，《中國哲學史》下冊，中華書局，1961 年新 1 版。

② 《中國哲學史》下冊，第 492 頁。

③ 不妨一喻，春秋戰國仿佛希臘時代，秦漢以後仿佛羅馬時代。所以前者的理論建構必然要轉換爲後者的制度實踐。這就意味着，後戰國思想史價值往往不在於觀念演繹，而在於觀念實踐。

④ 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用某一個特別大的“超級概念”來貫通幾千年，總有些不妥。

“道術統一”的學說，而且有一種“思想統一的運動”^①。其原因有三：第一，政治一統論。“就統治者說，思想統一是必需的。因為統治者一方面在決定政策上，必需有一個一貫的理論根據，一方面在政策施行上，也需不受太多的龐雜不一致的批評，所有的統治者，大概都是主張思想統一的，自戰國至秦漢，政治上既趨向‘大統一’，所以統治者亦提倡思想統一”。第二，真理一元論。人們相信真理“本來而且只能有一個。既信真理為一，則對於各家之學之矛盾分歧，必有人思有以‘一’之”。第三，思想邏輯論。“就思想史之發展言，經過一‘百家爭鳴’之時代，隨後亦常有一綜合整理之時代”^②。雜家因此而生^③。

① 馮氏專門區分了“道術統一”與“思想統一”。主張道術統一的有儒道兩家。“戰國末期道術統一說與道家之興起，很有關係”。儒道雖主張道術統一，但《荀子》邏輯是以自家而統他家，則只會“罷黜百家”，而不會折衷百家。《天下篇》認為“方術不能統一，又不想去統一”。而韓非子“只有統一思想的學說，而沒有‘道術統一’的學說”。韓非子統一思想的辦法是：“採道家清虛無為之論，以為其君道無為之說，採儒者之忠君正名及其他各家有利於治世強國之學說，以為法之內容。”（《原雜家》）

② 《原雜家》。

③ “凡企圖把不同或相反的學說，折中調和，而使之統一的，都是雜家的態度，都是雜家的精神”。“雜家者流，出於食客”。馮氏在注釋中進一步說明，如果“不治而議論”之大夫即為“議官”，“實亦即是食客”。雜家的特點是，“第一，‘道術統一’說之中心觀點，為戰國末期儒道二家所公認者。此說以為道術之全，包括所有的學說，或包括所有學說之‘好’的一方面”。“第二，對於百家之學，‘道術統一’說以為他們都見到總全道術之一偏一隅，這也是荀子和《天下篇》所共同主張的”。“第三，雜家又採取荀子、韓非子的見解，認為各家學說，有統一之必要。就實用上說，學說必須統一不二，才不至惑亂法令，混淆是非；就知識上說，必知大全的道術，才算全知之士”。似乎可以說，秦漢各家“都有雜家的傾向”。有人將其視之為“通病”，有人則看作“時尚”。但雜家不能解決思想統一的問題，“雜家正如陳勝吳廣，所謂‘為王者驅除難耳’”（《原雜家》）。